

# 了解世界怎样做语言规划

——序《语言规划经典译丛》

李宇明

“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是指政府、社会组织或学术部门等对语言生活(Language Situation)所做的干预、管理及相关计划,其中包含语言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等内容。研究语言规划的学科可称为语言规划学。

传统上,语言规划可分为语言地位规划(Language Status Planning)和语言本体规划(Language Corpus Planning)。地位规划确定语言(包括文字)及其变体的社会地位,内容较多涉及语言政策,比如国语的选择、民族共同语的确定等等。本体规划是在地位规划的前提下进行的,目标是促进国语、民族共同语等这些有社会地位的语言不断规范、完善,使其能够很好发挥地位规划赋予的语言职能。本体规划的内容,包括文字的创制与改革,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规范,拼音或注音方案的创制,以及各种语言技术的发展等等。今天常说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基本内容都属于语言的本体规划。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语言规划者认识到,国家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应当是管理语言生活,而不是管理语言,虽然管理语言生活必然会涉及语言本体。语言生活在哪里?在各行各业中,在各个社会领域中,因此,管理国家语言生活,主要任务就是管理各领域的语言生活,为各领域做“语言功能规划”(Language Function Planning,见李宇明《语言功能规划刍议》,《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1期)。语言功能规划,是在语言地位规划的总体框架内,更仔细地确定各种语言文字(及语言变体)的社会功能,规划各个社会领域怎样综合发挥各种语言文字的作用,目的在于使各种语言文字各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构建起多种语言现象互补共生、和谐相处的“多言多语”生活。

人类语言规划的活动早已开始,但是语言规划学却十分年轻。1959年,豪根(Haugen)最早提出语言规划的概念,之后涌现出一批语言规划的

经典著作,如《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Fishman, Ferguson and Das Gupta 1968),《语言可以规划吗?——专为发展中国家所用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和实践》(Rubin and Jernudd 1971)、《语言规划的进展》(Fishman 1974)等。这些著作奠定了语言规划学的基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语言规划研究仿佛走入了低谷,但进入21世纪之后又重受关注。这得益于新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思潮,如新一轮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世界性的大移民,复苏的族裔—民族主义,语言危机,英语在全球的传播,一批新国家的出现等。据研究,当前国际语言规划研究表现出四大特点:

第一,研究范围急速扩展。除传统的研究内容之外,又增添了当代语言生活的许多问题,如语言认同,语言复兴,少数族裔和外国移民的语言权利,双语教育,全球化与语言多样性,语言的国际传播,语言濒危与语言保护,语言信息化等等。

第二,研究视野涉及全球。过去,语言规划主要关注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而今的研究视野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等移民国家、西方老牌的单一民族国家、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国家、各种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等,它们的语言问题都引起了语言规划者的浓厚兴趣。可以说,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都纳入了语言规划的研究视野。

第三,研究观念发生转变。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语言多样性常被看作社会麻烦,看作阻碍国家建设的离心力量。那时语言政策的宗旨,就是确定单一或有限的官方语言,并尽力去完善、推广。但是,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最近10年,人们对待语言多样性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各种语言及其变体,被看作是值得珍视、应当努力保护的人类公共财富,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系列文件,欧盟的一长串官方语言名单,便是维护语言多样性这一态度的具体体现。

第四,多学科共同参与。语言生活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也是众多学科研究的对象;语言规划绝不仅仅是规划语言,规划的是众多学科共同关心的社会语言生活。事实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民族学、传播学、信息科学等学科,都已纷纷进入语言规划领域,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语言规划正在成为政治家关心、多学科参与、影响国家与国际新秩序建构的学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语言规划的国家之一。先秦诸子早就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人的言语行为规范。孔夫子主张“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提倡在庄重场合使用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

语·述而》)。战国时代的鸿儒子思,在《中庸》中已有“书同文”的记述,虽然其真其伪后世莫辨,但在秦国席卷天下、横扫六合之时,确实以政府力量推行了“书同文”政策,用小篆统一了六国文字。北魏孝文帝“断诸北语,一从正音”,进行了著名的语言改革。历史上许多朝代都颁布过字书、韵书,统一文字、音韵等标准。特别是从清末到民国,语言规划的实践进入现代阶段,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等,都汇入到救亡图存的滚滚历史洪流中。新中国实行语言平等政策,普通话推广、汉字改革、少数民族文字设计、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等重大语言规划,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保障语言权利、和谐语言生活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国有悠久而广泛的语言规划实践,有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法规与言论,有专门的语言文字工作机构,但是语言规划学的发展却不怎么理想。其一,对中国语言规划的三千年历史缺乏系统梳理,对百年来的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缺乏科学总结,对中国当下的语言生活缺乏全面研究,对中国语言生活的未来发展缺乏逻辑预判。其二,对世界各国语言规划的情况了解不够、研究不够,对各种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关注不够、参与不够,对国际语言规划学的成果介绍引进不够。其三,没有全面及时地向外介绍中国语言规划的情况,因而也妨碍了国际语言规划学界从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中汲取学术营养。

当前,中国语言生活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导的“多言多语”生活正在形成,解决语言矛盾,维护语言权利,做好语言服务,成为国家重要的语言文字工作。第二,混合型语言交际方式(人与人的交际、人与机器的交际、机器与机器的交际)已经实现,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快速发展,社会正在产生一批新的语言产业、语言职业,语言与经济的关系空前密切。第三,中国正在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步伐空前加大,国外语言生活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第四,公民的语言能力关乎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已经写入国家的语言规划,并且也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衡量国家语言能力的基本要求是,世界任何地方发生需要国家解决的事件,国家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当然更为远大的目标,是在国家发展中能够充分获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的“语言红利”。

在语言生活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显然需要更为科学的语言规划;科学的语言规划显然需要语言规划学的支撑,语言生活的现实呼吁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发展。《语言规划经典译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语言规划经典译丛》酝酿多年,列入译丛的都是本学科的经典之作,并聘请外语水平高且谙熟专业的行家进行翻译。遴选经典的过程得到了国外专家甚至作者本人的大力支持,翻译过程又有专家团队支援,完稿之后再经专家认真审订。这种“精品意识”和严谨的操作,本身也具有“经典性”。

大约是2004年,一些学界同人曾经建议编辑出版三套系列丛书:《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从政府的角度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的现状;《中国语言生活蓝皮书》,从学术的角度讨论语言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对策和建议;《语言生活黄皮书》,介绍国外语言生活状况,并及时引入国际语言规划的学术成果。数年过去,《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已形成AB两个系列,其中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从2005年开始逐年发布,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中国语言生活蓝皮书》也曾数度开会,数拟提纲,但因其工作难度大,至今仍是理念之物。《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大约可以看作《语言生活黄皮书》的一部分,它的出版,把语言生活系列“皮书”的计划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这套丛书更为重要的意义,是能够促进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发展,并可以为中国语言生活的规划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2011年4月5日,清明节